

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

吕同六 主编



YIDALI
ERSHISHIJI
WENXUECONGSHU

千方百计

莱奥纳多·夏侠 著

李国庆
吕同六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YI DA LI ER SHI SHI JI WEN XUE CONG SHU

登记号

120366

八九

1546.01

003

003

千方百计

莱奥纳多·夏侠

李国庆 译

吕同六

著

吕同六 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石油0111837



(皖)新登字 04 号

莱奥那多·夏侯 著

千方百计

吕同六 主编 吕同六 李国庆 译

责任编辑：张 磊 林 敏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省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

插 页：2

字 数：160,000

版 次：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1219-3/I · 1120

定 价：5.4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探究光怪陆离的西西里

——评夏侠黑手党题材小说

呂同六

毋庸置疑，黑手党是意大利最独特、最敏感、最引世人注目的问题。世界各地的通讯社、电视、广播，几乎没有一天不播出跟黑手党相关的新闻。时至今日，人们围绕黑手党撰写了无数的著作，其中不乏读起来饶有兴味的书籍，或者堪称情深博大的学术著作。一位西西里作家甚至写了一部喜剧，那简直是一份为黑手党涂脂抹粉的辩护书。而在蔚为可观的文学作品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胆敢触及黑手党问题。只有一个人这样做了。他就是——夏侠。

夏侠以写西西里黑手党和政治题材小说而跻身文学大家之列，其声誉远远超越了西西里和意大利，其影响则大大超越了文学领域。夏侠获得如此的成就，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步登天的。意大利动荡而微妙的社会、政治环境，终年累月扎根于西西里故土而汲取的滋养，坚定的人生信念，执著的艺术追求，当是造就夏侠的成长与成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莱奥那多·夏侠(Leonardo Sciascia)(1921—1989)，是西西里人，他的家乡是位于这个岛屿最南端，也是整个意大利最穷困、最偏僻的阿格里琴岛地区的一个小镇，名叫雷加尔穆托。他的家庭是世代矿工之家，祖父当过硫矿的工人、工长，父亲也一辈子跟硫矿打交道。在故乡度过少年时代以后，夏侠进入省会卡塔尼塞塔的师范学校就读。1941年，年方二十的夏侠回到雷加尔穆托，进入一家粮食收购公司当职员。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他有机会熟悉小城方方面面的生活，接触小城形形色色的人物。

1949年，夏侠执教于家乡的一座中学。平静的校园没有能够使他胸腔中一颗年轻、躁动的心平静下来。他深深感到痛苦，他是位教员，但他觉得，他同宪兵、官吏等政府的其他“工具”相去不远，政府赐给他们面包，他们便沦为那些为害贫苦人民的骗子的同谋。1956年，他毅然辞去教职，到省教育局工作。翌年，他迁居西西里首府巴勒莫。

在西西里生活的二十六个春秋，对夏侠日后的创作，无疑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对西西里岛的风土人情，人事沧桑，新旧交替，有了异常深切的体验，获取了丰富的创作素材。雷加尔穆托、阿格里琴托、塔尼塞塔、巴勒莫，这些留下了他的人生足迹的地方，日后成了夏侠笔下那些动人心魄的善良与邪恶较量的场所；他异常了解、稔知于心的矿工、教员、官吏、豪绅和三教九流的人物，后来都在他的作品中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幕幕历史话剧。

夏侠从小酷爱文学，当然，穷乡僻壤和寒素之家难以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他便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如饥似渴地阅读意大利古典和当代文学作品，广泛涉猎法国、俄国、美国文学。他阅

读文学作品，绝不是仅仅出于兴趣，相反，他把书籍当作良师益友，以求通过阅读获得认识人生，理解现实的裨益。后来，他曾以不解自己的心情回顾这段经历：

“我常常被一种不可遏制的愿望所驱使，渴求从每一样事物的内部来认识事物。对于我而言，每一个人，每一件东西，全都犹如一部书，可以摊开于书桌上，任意翻阅……我一旦把它打开，一个世界便霍然呈现于我的眼前。”①

正因为这个缘故，夏侠特别推崇皮兰德娄、维尔加、德·罗贝托、布朗卡蒂等西西里作家。这些文学先辈和同乡的作品，帮助他开阔视野，升华认识，掌握揭开西西里扑朔迷离的现实的钥匙。

夏侠的文学创作始于四十年代末。打一开始，他便是怀着一种虔诚、热烈、甚至痴迷的精神拿起笔杆的。他对此有一段生动至极的叙述：

“我对写作坚贞不二地倾注了一腔爱恋，我甚至爱上了那些供写作用的一切工具。孩提时代，我便喜爱练习簿、钢笔、铅笔、墨水。我这样频繁地使用这些东西，以致现在回忆这些往事，我似乎又嗅到了墨水的气息。兴许，我当真喝过墨水呢。几个月以前，我看到斯丹达尔用过的一个烟盒，从里到外密密麻麻地写了字；我油然想起，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没有一样我伸手可及的东西、木片、废纸、不是被我写满了字的。”①

夏侠最早的作品是1950年发表的《独裁者的童话》。这部闪耀着反法西斯精神的童话，没有引起批评界应有的重视。随后西世的《雷加佩特拉教区》(1956)、《西西里大叔》(1958)，是夏侠蜚声文坛的力作。

① 卡塔涅依：《夏侠》，莫尼耶尔出版社，1979年，第54页。

① 安布罗依塞：《夏侠》，墨尔西雅出版社，1978年，第56页。

《雷加佩特拉教区》从作家自身经历的生活中撷取素材，对西西里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情，予以真切的描摹。这儿既有对岛屿历史的回顾，也有对外省小城生活的描绘，而透过这些回顾与描绘，则流露出对过去和现今的统治者的罪责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所进行的沉重的反思。

《西西里大叔》是一部中短篇集。其中的《四八年》是篇历史小说。作者采用倒叙的手法，把目光投向十九世纪中叶的西西里，着重描绘民族复兴运动在这块大地上掀起的洪波巨澜以及社会生活发生的变故，成功地塑造了在这场历史风暴中亮相的各式人物的形象，把封建贵族极端腐朽的真相昭示于众，表达了南方平民的失望情绪。小说借鉴了德·罗贝托反映民族复兴运动的名作《总督》(1894)，但又以新的眼光来审视和剖析历史，反照现实，因而又比作《总督》高出一筹。

集中另一则中篇《安蒂莫尼》以夏侠十分熟悉的西西里硫矿工人为主人公。面对矿井地狱般的生活，面对赤贫和死亡的威胁，主人公不得不告别矿井，宁愿选择任何别的生活方式，那怕是战争。于是他志愿去西班牙，参加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战斗。战斗是炼狱之火，驱除了他的迷误，洗涤了他的灵魂，他终于明悟，他事实上是在跟他一般的兄弟厮杀，他的枪口瞄准了西班牙的矿工、雇农。

集中还有一篇《斯大林之死》，表现二次大战后动荡不安的岁月里，西西里人经历的苦难的思想历程。

无论是把目光投向历史，还是投向西班牙内战，但都是殊途同归，立足当今。《西西里大叔》折射出对西西里故土和同胞的现状进行检讨和剖析的理性之光。

《雷加佩特拉教区》和《西西里大叔》的价值在于，作为夏侠文学活动的成名作，它们概括了作家后来在其他作品里以不同

的形式予以表现的所有主题。或者，正如作家本人所坦言：

“我的第一部小说《雷加佩特拉教区》概括了我后来在其他作品里以不同的方式予以表现的所有主题。……我的所有作品，其实就是一部作品。这是一部关于西西里的作品，它触及既往和现今的各种令人痛心疾首的问题，它不管是一部理智不断遭遇挫折的历史，是那些在挫折中被打倒和毁灭的人们的历史。”^①

从此，着力描绘西西里的历史与现状，展示在这块古老、美丽而又贫苦、落后的土地上发生的善与恶的残酷搏斗，便成为贯穿夏侠创作的一根红线。

二

六十年代，西西里迎来了迟到的工业、技术起飞。急速而紊乱的发展，加剧了西西里同北方原已尖锐的差距和矛盾。西西里陷入了异常复杂的、令人失望的境地。如今，它既同第一世界共处，但又面临第三世界的问题。它从表面的、无关宏旨的进步中获得好处，同时又遭受古老的和新生的弊病带来的双重痛楚。

原先以农村为大本营的黑手党，以此为契机，一举打进了城市，打进了金融、工业和政治领域。黑手党在一些地区窃取了政权，一些国家政权机关同黑手党同流合污。同政治权力的结合，使黑手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危害性，使它的罪恶活动在大红伞的保护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隐蔽性，也使同黑手党进行的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艰难性和危险性。黑手党不管是附着于意大利社会肌体的要害部位并恶性扩散的毒瘤。

正是从六十年代起，在上述社会政治大背景下，夏侠的创作

① 夏侠：《雷加佩特拉教区》1967年版自序。

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发表了为他赢得世界声誉的黑手党和政治题材系列小说：《白天的猫头鹰》（1961）、《各得其所》（1966）、《前因后果》（1971）、《千方百计》（1974）等。这些小说都以西西里为背景，用机锋犀利的笔墨，揭发黑手党在其巢穴西西里的猖狂肆虐，统治阶级的恣睢腐败以及同黑手党的狼狈为奸，从而准确地捕捉和深刻地展现了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本质特征。

《白天的猫头鹰》是夏侠黑手党题材系列小说的第一部。

小说以宪兵上尉贝洛迪受命侦查黑手党杀害一名不愿对他们俯首听命的建筑合作社经理的案件为贯穿全书的情节线索。贝洛迪曾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当过游击队员。他为人正直、刚毅，还透出几分机敏。经过周密的侦查，案情终于水落石出，凶手是某个马尔吉卡。贝洛迪打破了从凶杀案发生的那一刻起罪犯们便精心建立的攻守同盟，获取了凶手及唆使者们的供词、罪证。然而，在他返回家乡帕尔玛休假时，黑手党组织反扑，阴险地制造了罪犯不在犯罪现场等种种伪证，使形势急转直下，贝洛迪前功尽弃。

案件出乎意外的结局似乎在向人们提示：代表司法力量的贝洛迪上尉失败了。邪恶战胜了善良，黑手党的法压倒了国家的法、社会的法。贝洛迪面对的不只是一个马尔吉卡或者几个唆使者；他面对的是知情人和周围的人的恐惧和冷漠，他们的眼睛、耳朵和嘴巴全都闭上了；他面对的是黑手党同政界的沆瀣一气。这一切，组成了一道铜墙铁壁，横亘在他的面前。他孤军作战，同这铜墙铁壁撞击，注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宪兵上尉贝洛迪的形象，极富说服力地表明，比西西里的物质贫困更严重、更可怕的，是西西里精神、道德的贫困。贝洛迪与其说是在侦查一件凶杀案，毋宁说是为着疗救西西里精神、道德的贫困而行动。

小说结尾，宪兵上尉贝洛迪毅然决然地表示，他热爱西西里，纵然他不是西西里人，他将义无反顾地返回西西里。他大声说道：“我宁愿在那儿碰得头破血流。”这是掷地有声的誓言，表达了作家和一切正直者的信念，诚然上尉清楚意识到，在西西里，等待他的绝不是胜利，但这无关紧要。

《白天的猫头鹰》问世后五年，夏侠推出另一部黑手党题材的力作《各得其所》。

一位名叫拉乌腊纳的中学教员，无意中发现一起黑手党谋杀案的线索，出于好奇心，也出于正义感，不知不觉地去追踪案件的底细，结果惨遭黑手党的杀害。

夏侠在这部小说中有意识地超越侦查和破案的情节范畴。诚然，他的主人公拉乌腊纳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凶杀案的调查；然而，作家更多地关注的是主人公在侦查中同社会生活发生的关系，而不是侦查本身；换句话说，夏侠是借主人公进行社会调查。夏侠仅仅以简峭、凝炼的笔触交代情节纠葛的发展，而倾其全力进行社会深层的探究。

夏侠选择他的家乡阿格里琴托地区的故事情展开的舞台。透过精细入微地予以描绘的各个情节场面，读者分别看到了黑手党及其利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情景。一切都沒有改变。一切又似乎都在改变。但夏侠小说的鞭辟入里之处在于：它揭示了西西里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是表象，一切都沒有改变才是本相。这不由令人想起另一位著名西西里作家兰佩杜萨在历史小说《豹》中，揭露十九世纪下半叶封建贵族为了对付民族复兴运动的革命高潮所采取的策略：“一切都改变，为的是什么都不改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黑手党，继承了一个世纪前老祖宗的衣钵，也祭起了“以万变应不变”的法宝。可不，如今西西里在经济、技术发展的推动下，似乎开始发生了最初的变革，而骨子里，所有

的人和物都继续禁锢于不可动摇的成规之中。西西里继续从其传统的面貌凸现于读者的眼前。邪恶与阴谋，愚昧与沉默，编织成一张古老的、密不透风的、可怕的罗网。拉乌腊纳便是自投罗网。

拉乌腊纳是一座古典中学的意大利语和历史教员。他生活孤独，性格执拗。他半好奇半打抱不平地卷入了这宗案件。夏侠把调查凶案的任务交给了一位教员，而不是国家司法机关的代表。读者在小说中看不到司法机关的运作，而只见一个像当年的夏侠一样的中学语文教员，一个知识分子在履行这项职责。个中缘由不言而喻。在夏侠看来，司法机关在西西里的较量中失败了，因为司法机关竭力维护西西里的封闭落后和沉疴恶疾。

拉乌腊纳并不是一般侦探小说中习见的私人侦探。他要去解决司法机关无力也不愿去解决的难题。他天真而又坚定地扮演着执法官的角色，单枪匹马地向扑朔迷离的案件挑战。拉乌腊纳从意大利文学和诗歌中获得的聪明才智，是他唯一掌握着的斗争武器，何况他又太过单纯圣洁。而黑手党分子则完全隐去了他们一贯的耀武扬威的模样，退居幕后，成为一种幽灵，在暴行和恐怖的掩护下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拉乌腊纳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他显然是不自量力，这便注定了他的失败。

夏侠赋予了这个人物一切只有职业警官才应具有的特征，因此，拉乌腊纳的原本个人的、偶然的行为，便具有了典型的意义。他成了黑手党的罪恶与司法机关的无能的替罪羊。他的下场比《白天的猫头鹰》中慨然表示“我宁愿在那儿碰得头破血流”的贝洛迪上尉更加悲惨。他无法理解这个与他异己的世界。周围的人几乎打凶案发生之时起就明白了一切，或保持沉默，或订立攻守同盟。只有他一个人蒙在鼓里，“是个糊涂虫”，仍然执迷不悟地去调查，去追究。这沉默实际上是默许和纵容黑手党及其

罪恶活动。拉乌腊纳自然无力打破沉默、阴谋和攻守同盟的坚冰，反倒被这坚冰压垮了。堂卢易吉在小说结尾说的那句话：“他是个白痴……”，似乎成了他的墓志铭。他的横卧在一座报废的硫矿渣滓堆上的尸体，因而具有了涵蕴极深的象征意义。

拉乌腊纳的调查未能触动黑手党的一根毫毛，然而，它触及了黑手党赖以滋长、猖獗的社会。这个人物形象的价值，不在于他作为一个业余侦探的行为和遭遇，而在于他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个人同国家，个人行为同政治，历史遗留的邪恶同新的社会矛盾等种种根本性的冲突。具有辛辣的讽刺意味的是，拉乌腊纳的死使当地上流社会和教区恢复了一度失去的平静，使因凶杀案而解体的家庭重新组合。

夏侠写作《各得其所》的时候，怀着比写作《白天的猫头鹰》更其强烈的内心激动，更其深沉的愤慨。他充分认识到在西西里进行任何革新和改造的无比艰难。因此，他在《各得其所》中力图着重揭示这种变革同旧势力之间的巨大反差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对当时某些势力因经济、技术的进步而制造出来的美化现实的神话，表示不安与谴责。还在写作《各得其所》的时候，夏侠接受一家杂志的采访，指出：

“我坚持认为，意大利的南方问题仍然异常严峻地存在着。我们断然不可予以美化。”

在夏侠看来，西西里的环境及其邪恶，犹如长春藤的根，盘根错节，顽固不化，欲想改变它，全然是徒劳的。永恒的悲剧和痛苦的土地上绵绵不绝地滋生的痼疾顽症，又一次沉重地叩击着读者的心灵。读罢《各得其所》，小说中一位叫贝尼托的人物的话语，仍犹如警钟在耳边回响：

“西西里岛如同一艘海盗船，船只正在沉没，我的朋友，正在沉没”。

在《各得其所面世之后》，夏侠陆续写了十余篇短篇小说（结集为《葡萄酒色的大海》，1973年出版），随后，夏侠又返回长篇小说创作，于1975年发表了《千方百计》。

《千方百计》，原文为Todo modo，语出耶稣会创始人依纳蒂·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原意系指顺应天主圣意的最好方式。夏侠用来作为书名，其涵义是表明，他利用与借助既往的历史材料，尽可能深地开挖他所处的时代的现实。

在西西里一座豪华神秘的旅馆里，聚集了一批形形色色的头面人物：执政党的部长、议员、企业家、文化界名流、大主教、红衣主教等。他们汇聚在这儿，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进行“静省”，即集中一段时间按照宗教礼仪进行默想、反省。不料，这些显要人物“静省”的结果，却是接连发生三桩骇人听闻的凶杀案。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颇负盛名的画家，四十来岁。他外出度假，很偶然来到这座旅馆，小住数日，从而成为在那儿不幸发生的一切的目睹者。画家来到旅馆，正是某种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事件行将发生的时候。他纯粹受一种特殊的、职业的好奇心所驱使，把目睹这儿发生的一切，当作一种饶有兴味的消遣，他绝对没有对事件追根究底的愿望。他同那些政界、财界、宗教界的显要们不同，他冷眼旁观他们，客观地评估他们。他以艺术家敏锐的目光，起初以愉悦的心情，继而满怀惊慌不安，对发生的一切作了记录。

豪华旅馆里的那些神秘客人，手里掌握着政治、经济大权，聚敛着权力和金钱。他们在这儿“静省”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进行秘密的政治交易，进行权力的再分配，或者说，每一方都力图尽可能更多地、更有利地瓜分权力。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种种阴谋诡计，而正是这些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打破了一潭死水，掀起了汹涌波涛，引爆了一向用妥协、勾结包装起来的火药桶。

一系列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终于酿成了一桩桩凶杀案，撕下了上层人物进行不可告人的政治交易的黑幕。

夏侠以极其明晰的、理性的剖析，把社会现实和统治阶层的种种龌龊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揭示出国家和社会的衰败，人们习惯地依赖准则、公众机构，在万花筒般的变幻以后，最终也腐敗了，就像皮兰德娄笔下的人物惊骇地发现，他们的人格、完整性丧失了，自我也可悲地肢解了。

书中的堂加埃塔诺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他精通西方文化，从启蒙主义到实证主义，无所不晓，不愧为富有教养的神甫。他沉稳、老道，因为他善于借助他的渊博学识和出入上流社会的交际手腕来掩盖他的老谋深算。广闻博学使他获得了一层文化人的保护色，老谋深算则使他得心应手地进入上流社会。他既真诚可爱，又厚颜无耻，他既从内心深处鄙夷那些上层人物，又巧妙地同他们周旋。

我们不由得想起神甫的那段自白：我们的肉眼无法瞧见奶酪上的蛆的爪子，但这并不是说蛆不存在；而我就是奶酪上的一条蛆，所以别的蛆的爪子我看得一清二楚。这自白坦率得可爱，真切得可信，真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

堂加埃塔的猝死意味深长。他是最后一个牺牲者。其实，归根结蒂，在这场神秘莫测的政治游戏中，很难说有真正的胜利者。堂加埃塔的死仅仅能够证明，胜利属于神秘和沉默。

在这部小说中，行为发生的空间与时间高度浓缩了，夏侠似乎返回到古典主义，遵循它的行为、地点、时间一致的三一律。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限定和制约了艺术虚构和创造性所需要的空間和自由度，然而，却突出了小说中叙述的事件的可信性，赋予了读者返归现实和直接投入的契机，而这，正是同作家一贯的创作旨趣吻合的。

《千方百计》中发生的事件，惊心动魄，骇人听闻，但一经夏侠借用画家的第一人称予以徐缓有致的叙述，便显得异常紧凑、敏捷，显得异常从容自如，不动声色，从而为作家的哲理性的，思辨性的探求提供了条件。画家的叙述又注意去除蔓枝繁叶，以求达到最大限度的洗炼，这样就借助这些事实本身把揭露的锋芒更明快地指向现实，用事实本身来让人震惊和彻骨。

三

夏侠步入文坛，声誉日隆之日，正是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精神所孕育的新现实主义文学衰落之时。不过，在新现实主义薰陶下成长的夏侠，很明显地接受了它的影响。新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历史的、同时代人的现实的执著的关注，对认识这一现实和让人们认识这一现实的渴求。而这，同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真实主义文学，同西西里文化传统，又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认为，夏侠是西西里文化传统的直接继承者。这西西里文化顽强地拒绝对现实作浪漫情调的、变形的选择，而始终不渝地遵循客观地表现现实与真实的道路。无论是真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都曾着力表现南方贫苦农民、牧人同社会的对抗，南方同北方的对峙。随着时代的变化，夏侠的小说自然也采用了不同于真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的题材、形式，然而，作为西西作家，夏侠虔诚地忠实于西西里大地哺育的真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作家们的诗学，他的人生和文学道路，他的小说对西西里现实的历史的、真实的表现，无不深深打上了西西里文化特有的印记。

夏侠是最典型的，同时又是最具独特的个性的西西里作家。他的小说不是建筑于无关宏旨的、短暂性的，因而是局限性很大的事件，而是立足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动态的事件。作家的叙事

材料虽然常常同别的南方作家相近或吻合，但夏侠独标一格，他始终不渝地、执著地在人物、环境的发展机制中，在它们的最具体的、以人为本的确定性中予以刻划。他笔下的主人公充分意识到时代的责任感，意识到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社会义务的分量。西西里不再是遥远的、富有童话、传奇色彩的地域，而是处于运动之中的、具有双重个性的、充溢着活力的环境。这是多色调的、奇特的，然而真实可信的，混和着痛楚和荒唐，包含着深深的屈辱的西西里。作家不再是止于对不可捉摸的、同时又无法抗拒的命运的哀叹，而是运用强烈的对照和反差，展示西西里的社会和群体的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分化，对西西里进行解剖，并让西西里自我解剖，探寻西西里悲剧产生的生存环境、历史根源和人们的心理基础。

夏侠曾申明，他对文学作品的体裁不感兴趣。他对“非纯粹的叙事”，即不拘泥于一种形态的叙事唯有独钟。因此，他的叙事技巧有点不拘一格，不守章法。道理很简单。他如饥似渴地追求现实与真实，这是他的全部创作活动的命脉和中心。对此，他曾作了这样明确的说明：

“我‘展示’某种东西，藉以表现构思的和虚拟的事件，而所谓的构思，其实是寻得的意思，即在历史和新闻中寻得的事实。”

当然，夏侠更渴求引导读者去译解现实，揭示真实。这就是他选择叙事形态的出发点。

夏侠以为，资产者社会竭力切断读者认识西西里现实的可能性，因此，只有采用某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的艺术形态，才能使读者摆脱资产者社会的封锁和阻挠。为此，夏侠让读者直面他们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的种种矛盾和阴谋，让他们亲眼目睹这些矛盾和阴谋像榴弹一样砰然爆炸。于是，夏侠便选择侦探小说这一体裁，作为传达他这一思想的外在载体。

事实上，他的小说也确有点像常见的侦探小说一样，情节曲折，悬念丛生，但作家绝不是故弄玄虚。夏侠借鉴侦探小说的体裁，不仅仅因为可以用生活原本就是这样来解释，而且是因为这种结构形态同作者对生活的思考取得了和谐的一致。夏侠把风土人情、政治、文学、哲理、荒诞，统统包容了进去，从而建构了多层面的、充满暗示性和揭露性，富有诱惑力的叙事结构。而这种借取侦探小说为外在载体，以历史的真实性和哲理的思辨性为内核的创作，既同一般商业化的侦探小说划清了界限，又是对文学传统的一种挑战。

在传统的侦探小说中，必然有一位依靠公认的法则，在国家权力范畴内进行侦查活动，并且永远正确无误的侦探。此类小说有一套固定的模式：侦探奔赴凶案现场，从种种蛛丝马迹中寻觅和筛选线索，惊险的、一波三折的侦查，知情人的告发，最终真相大白，凶手落网。而夏侠的兴趣点并不在于一起起血案，他的小说也不像一般的侦探小说那样有着破案的结局，这于他是无关紧要的。夏侠生活于黑手党和教会势力猖獗的社会，在那儿，法律和国家机器无法提供生存的保证，出卖法律和理想的力量朋比为奸。法律显得那么遥远、抽象，甚至戏弄人们。不妨引用夏侠讲过的一段话：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小说家。我仅仅是个诉状作者，这对于我已意味着很多了。”

好一个“诉状作者”！这意味着，作家夏侠自觉地扮演着原告的角色，小说于他便是一份控告社会的状子，便是向黑暗势力奋然掷去的投枪。他要揭露令人痛苦和愤懑的现实，追究正义正在消亡的严峻现实。小说中描写的案件所涉及的历史社会环境，为作家提供了揭发和追究这个现实的契机。探案因此具有了政治的、社会的和形而上的特征。这样，在西西里岛发生的事件、血